

当代中国学术文库

江南文化

与南唐词

张
丽◎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当代中国学术文库

江南文化

与南唐词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江南文化与南唐词 / 张丽著.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5. 2

ISBN 978-7-5034-6111-8

I. ①江… II. ①张… III. ①词 (文学) —诗词研究 —中国—南唐 IV. ①I207. 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39343 号

责任编辑: 李晓薇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66192703

印 装: 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70mm × 240mm 1/16

印 张: 14

字 数: 208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8.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CONTENTS

绪 论	1
(一)南唐词研究情况述评	1
(二)本著创新之处和写作意义	4
一、诗性江南的文化阐释	7
(一)“江南”的历史衍变与生态环境特征	7
(二)江南诗性文化内涵	12
(三)江南文化的历史整合	20
(四)六朝江南文化的特征	25
二、五代江南开发背景下南唐词的发展	32
(一)五代时期江南社会发展状况	32
(二)吴、南唐的经济、政治建设	42
(三)五代文风及南唐词概述	53
三、南唐词中江南的表象特征	63
(一)江南典型物象群	65
(二)江南吴声	79
(三)江南文化的其他表征	89

四、江南文化的深层影响 93

(一)五代江南伎乐兴盛 94

(二)江南宗教之风 104

(三)江南文化的审美品格 117

(四)金陵意象 128

五、南唐词与西蜀词辨异 135

(一)西蜀词概述 135

(二)西蜀和南唐的传统文化差异 144

(三)艳情和苦情 151

(四)两地创作主体、创作环境之别 160

六、南唐词之于词体及江南文化的意义 171

(一)对词体的进一步完善 174

(二)词风雅化 179

(三)南唐词主体意识的确立 186

(四)文化南渐 196

结 语 205

参考文献 207

后 记 217

绪 论

(一)南唐词研究情况述评

唐五代词历来被学界视作词体发展演变的原初状态,词在唐五代时期的发展,堪与先秦诸子散文、汉魏乐府诗相并提。这一时期包括中晚唐文人词、敦煌曲子词、花间词、南唐词等,在词体价值和地位都不稳定的历史环境中,于题材、意蕴、技巧风格等方面为后世特别是宋词体创作提供了范式,并有助于逐步确立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清人冯煦在评述唐五代词发生发展中特别推崇南唐词的价值,甚而将其被誉为“词家渊丛”,为冯延巳词集所做的序《阳春集序》中云:“词虽导源于李唐,然太白、乐天兴到之作,非其专诣。逮到季叶,兹事始发,温韦崛起,专精令体。南唐起于江左,祖尚音律,二主倡于上,翁(冯延巳)和于下,遂为词家渊丛。”^①此序为较早的唐宋词学批评资料,影响深远。回溯词体研究的历史,毫不夸张地说,对南唐词的欣赏和研究伴随贯穿了中国词史发展的整个历程。

以现有文献资料梳理学界对南唐词的研究,可考资料主要从散见的宋人诗话、词话、笔记、词籍序跋、词学专著来看,宋代李煜文才已广为人知,作品也流传广泛,较早进入词学批评视野,评点较多。如宋人叶梦得《石林燕语》记载:宋太宗称誉李煜“好一个翰林学士”,苏辙题后主《临江仙》(樱桃落尽)云:

^① (清)冯煦《阳春集序》,王兆鹏主编:《唐宋词汇评》,浙江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423~424页。

凄凉怨慕,真亡国之声也。李清照评江南李氏君臣词云:语虽奇甚,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也!有些评点较为突出的就是集中于纪词本事,如蔡绦《西清话》、陈鹄《耆旧续闻》、葛立方《韵语阳秋》、张邦基《墨庄漫录》、胡仔《苕溪渔隐丛话》皆记李煜于城破之际作《临江仙·樱桃落尽春归去》。王铨《默记》、陆游《避暑漫抄》则论李煜被俘后因作词而引杀身之祸。明清时期对南唐词的研究,进一步与当时文艺观词学思想相连,注重南唐词言情特质和词学地位,与宋人较浓的政治色彩相比,更多的是鉴赏肯定南唐词本身的价值。如清王又华《古今词论》引沈谦语:男中李后主,女中李易安,皆是当行本色,前此太白,故称词家三李。^①明清两代辑录唐五代词有比较重要的两项成果,明万历年间董逢元辑录的《唐词纪》和清康熙年间编纂《全唐诗》,是整理研究南唐词学的宝贵资料。目前可见的宋明清时期相关记叙南唐国别历史,重要人物的活动行事,词人词作本事的正史、野史、笔记小说、别集、词话诗话等,主要有(南唐)史虚白《钓矶立谈》,(南唐)徐铉《徐公文集》,(南唐)李建勋《李丞相诗集》,(宋)陆游《南唐书》,(宋)马令《南唐书》,(宋)陶岳《五代史补》,(宋)郑文宝《南唐近事》、《江南余载》、《江表志》,(宋)龙亢《江南野史》,(宋)陈彭年《江南别录》,(宋)路振《九国志》,(宋)无名氏《五国故事》,(宋)王溥《五国会要》,(宋)孙光宪《北梦琐言》,(宋)吴处厚《青箱杂记》,(宋)魏泰《东轩笔录》,(宋)文莹《玉壶清话》、《湘山野录》,(宋)张师正《倦游杂录》,(宋)罗大经《鹤林玉露》,(明)阮阅《诗话总龟》,(清)李调元的《全五代诗》,(清)吴任臣《十国春秋》,(清)彭定求编《全唐诗》,今人陈顺烈、许佃玺《五代诗选》,以及(宋)欧阳修《六一诗话》,(宋)陈师道《后山诗话》,(宋)黄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宋)胡仔《苕溪渔隐词话》,(宋)吴曾《能改斋漫录》,(明)杨慎《词品》,(明)徐士俊、卓人月合辑《古今词统》,(明)茅暎编选《词的》,(明)陈子龙《幽兰草词序》,(清)彭孙遹《旷庵词序》,(清)贺裳《皱水轩词筌》,(清)郭麐《灵芬馆词话》,(清)王士禛《五代诗话》,(清)刘熙载《艺概·词概》等。

进入20世纪,南唐词的研究与二三十年代和80年代两次大的词学思潮联系

① 唐圭璋:《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77页。

紧密,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二三十年代的研究成果首先体现在对唐五代词的研究渐呈系统,重视词籍辑佚的整理工作。清末民初,较早从事唐五代词辑录整理的学者王国维编选了《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涵盖了包括花间词人、李璟、李煜的《南唐二主词》《金筌词》《红叶稿》《浣花词》《薛侍郎词》等作品,这被视作第一部唐五代词集,共二十卷,各卷之后附有跋,列举辑录依据,其辑录体例及文献价值影响深远。此外还有刘毓盘编著《唐五代宋辽金元名家词集六十种辑》、林大椿辑录《唐五代词》、胡适的《词选》中胡适对李煜词推崇备至。南唐词人在唐五代词众多流派中得到更多的关注,这一时段研究李后主及其词较有成果的还有郑振铎《李后主词》、曹雨群《李后主的著述及其版本》等。

30年代词学界对词的起源问题、词史、词籍以及词人都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如刘毓盘《词史》、胡云翼《中国词史大纲》、王易的《词曲史》等。出版了多部相关南唐词人年谱及评传,如唐圭璋《南唐二主词汇笺》,衣虹《南唐后主李煜年谱》,郭德浩《李后主评传》,夏承焘《冯正中年谱》《南唐二主年谱》,此外,学界开始从词人身世、社会环境、宗教等方面深入分析作品文本,如龙沐勋《南唐二主词叙论》。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唐五代词集整理方面,张璋、黄畬的《全唐五代词》,较为全面地收录南唐词人李璟词5首、李煜词45首、冯延巳词112首。这一时期产生了对南唐词人冯延巳、李璟、李煜等词集的新校注本和生平更详备的考证。如曾昭岷《温韦冯词新校》,杨琳《冯延巳还是冯延己》,傅正谷、王沛霖《南唐二主词析释》,高兰、孟祥鲁《李后主年表》,此外还有傅璇琮、张枕石、许逸民编纂的《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等,为深入研究南唐词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文献资料。也是在这一时期,随着西方文艺理论不断渗入,词学研究开始从意识、意象、文化学、比较学等角度对南唐词进行观照。20世纪90年代这些研究视野得到进一步的拓展。21世纪初随着对唐五代词综合性文献整理和综述研究的加强,对南唐词的研究进一步深入,比较突出的是关于南唐词接受史研究和唐五代词定量分析。

总体而言,对南唐词已有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

1. 作品文本的编纂整理:如王国维编纂的《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林大

椿编《唐五代词》，1980年张璋和黄畬合编《全唐五代词》。

2. 重要词籍校注：比较有影响的是对《阳春集》《南唐二主词》的校订，以及50年代詹安泰著《李璟李煜词》和80年代曾昭岷著《温韦冯词新校》。

3. 词人生平年谱的整理：如夏承焘《唐宋词人年谱》，唐圭璋《南唐二主年表》《李后主评传》，陈尚君《花间词人辑》等一些较为翔实的文献资料。

4. 重要词人的研究：依据创作成就和文学地位对南唐词人的研究多集中于二李一冯，并从多角度分析词人词作。

5. 风格流派渐趋清晰：词史演进中，唐五代词虽处于词体发生发展阶段，但敦煌曲子词、中晚唐文人词、花间词、南唐词，各阶段风格相对鲜明和集中，加强风格流派的研究也将探究南唐词推到一个新的高度。

6. 引入新的研究方法拓展新的理论视野：尤其体现于新时期以来对南唐词的研究走出僵化、狭窄、单调的学术套路，不断尝试新的研究方法。如比较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传播学等，为南唐词的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二）本著创新之处和写作意义

李凯尔特评价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区别时指出，人文科学的研究重心在于具体和个别的事实，而个别的事实只有参照某种价值体系——这不过是文化的别名——才能被发现和理解。^①

就词体发展的场域而言，词在唐宋两代并非仅仅是种文学现象，不是独立的，而是时代之政治、思想、艺术、生活等之印迹。词的产生和风行首先赖于燕乐这种具有时代特征的音乐环境，此外还涉及社会文化习俗、人们的社交方式、宴集歌伎盛行以及文人的特殊心态等一系列问题。词的社交功能与娱乐功能乃至抒情功能渐次相生相伴。可以说词是在综合上述复杂因素在内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文学——文化现象。^② 纵观学界对南唐词的研究，与相对繁盛的南唐词研究成果相比，从地域文化角度对南唐词进行深入研究成果

① （美）勒内·韦勒克斯斯汀·沃伦：《文学理论》，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版，第5页。

② 吴熊和：《唐宋词通论》，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有些薄弱。南唐地处江南^①,深受江南文化影响,可以说江南文化对南唐词有着延续性的影响。为避免孤立的研究本体,达到对研究对象真正的理解,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本书从地缘环境入手,尽可能还原南唐词的社会文化背景,勾勒南唐词人活动创作的具体时空场景,以丰富和深化南唐词及地域文化研究。

从地域文化的角度对南唐词作新的阐释,不仅由于南唐词所具有的区域特色,也是基于对地域文化视角的应用历史,当下的社会文化环境和学术潮流的综合思考所致。

文化与地域的关系研究由来已久,中国古代的典籍《汉书》《世说新语》《北史》等著作已注意到地缘影响南北学术的不同。近代学者以梁启超、刘师培、王国维等为代表,关注到南北文化差异与地理环境的紧密联系。不仅在中国,在西方,地域和文学的关系也较早进入批评家视野。法国文学评论家斯达尔夫人《论文学》提出存在两种不同的文学,一来自南方,一来自北方。法国丹纳《艺术哲学》中更进一步强调地理环境对文艺的影响。新世纪之后,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地域研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被广泛接受。1990年,袁行霈先生《中国文学概论》一书,提出了“中国文学的研究,除了史的叙述、作家作品的考证评论,以及文体的描述外,还有一个被忽视的重要方面,就是地域研究”,这个颇富启发意义的观点,对当时的文学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为古代文学研究确立新的视点,随之产生了一系列相关著作,包括杨义先生《重绘中国文学地图通释》、戴伟华《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梅新林《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曾大兴《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胡阿祥《魏晋本土文学地理研究》等。近年来学界在地域文学理论与实证性方面大胆探索,其中对江南文化的研究尤为丰富。专著有李学勤先生等主编的《长江文化史》、美国学者林达·约翰逊主编的《帝国晚期的江南城市》、梅新林和陈国灿两位先生主编的《江南城市化进程与文化转型研究》、江庆柏先生的《明清江南望族文化研究》、

① 南唐历史上建国都金陵(今南京)和洪州(今江西南昌)。

樊树志先生的《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小田先生的《江南场景:社会史的跨学科对话》、范金民先生的《江南儒商与江南社会》,以及极富学术价值的高小康《永嘉东渡与中国文艺传统的蜕变》和《中国古典艺术精神的形成》、刘士林《江南都市文化的历史源流及现代阐释论纲》《江南文化的诗性阐释》《在江南发现儒学遗产》《江南轴心期与中国古典美学精神的生成》等,都在江南地域文化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和探索。这些学术成果在学理上奠定了深入研究江南文化的理论基础,也进一步延伸了对地处江南的南唐及南唐词的研究视角。刘士林在《西洲在何处——江南文化的诗性叙事》一书中提出中国诗性文化的南北之分。他认为中国诗性文化有两个系统,一个是以政治伦理为深层结构的“北国诗性文化”,另一个是以审美自由为基本理念的“江南诗性文化”。强调江南文化中的审美自由并不等于说其他区域文化没有审美的精神内核,而是说江南文化的审美维度在中国审美历史上最具有纯粹性和特殊性。“江南诗性文化是中国人文精神的最高代表”,^①江南文化几乎成为六朝以降中国文人士大夫生命经验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为江南文化所化的南唐词人,与其他流派甚至与同时期其他地区词人相比,突出之处并不在于他们帝王将相的身份,而在于他们与生俱来的审美感受力和审美品质,并在他们身上展示了不同于传统文士且影响后世深远的一些新型特点。南唐上接大唐,下启赵宋,以南唐词为代表的成就斐然的南唐文化,实际是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的重要过渡,反映出唐宋之交中国社会尤其是江南社会文化的变迁。

本书在传统历史叙述的时间维度基础上,结合地理维度和精神维度,将以前对南唐词重在静态、平面、单向的研究,转换为以地域文化为切入点的动态、立体、多元的研究,力求做到宏观历史视角和微观透彻分析相结合、理性客观分析与感性直观审美相结合,并致力于作家、作品、语境的研读,综合运用史学、文化学、心理学、文化地理学、社会学等研究方法,结合史实及词体本身的研究规律,对南唐词作较为全面的考察。

① 刘士林:《江南诗性文化:内涵、方法与话语》,载《江海学刊》,2006年第1期。

一、诗性江南的文化阐释

(一)“江南”的历史衍变与生态环境特征

1. “江南”溯源

“江南”从字面上理解是指长江以南的地区,先秦和秦汉典籍中多处出现“江南”之语。较早《尔雅·释地》中记载:“两河间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雍州。汉南曰荊州。江南曰扬州。”又《尔雅·释山》:“河南华。河西岳。河东岱。河北恒。江南衡。”先秦分天下为九州,其中的“扬州”,约相当于今天的长江下游地区。据沈学民先生考证,春秋时期,“江南”指楚国邹都(今江陵)对岸的东南地段,范围极小。战国时期,楚在长江南岸拓地日广,江南的范围亦随之向东南扩展,延及今武昌以南及湘江流域。^①秦汉时期,江南主要指“长江中游以南的地区,即今湖北南部和湖南全部,南达南岭一线”。^②《史记·货殖列传》有“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之说。《史记·秦本纪》中载:“秦昭襄王三十年,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黔中郡即今湖南西部。汉代,江南的范围有所扩展,包括豫章郡、丹阳郡及会稽郡北部,相当于今天的江西、安徽及江苏南部地区。《史记》卷六云:“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会稽郡”;《后汉书》卷十四亦有相关的记载,“信遂将兵平定江南,据豫章”。相对于长江中游的江南地区而言,秦汉指称下游的江南地区还

① 沈学民:《江南考说》、徐茂明:《江南的历史内涵与区域变迁》,载《史林》,2002年第3期。

② 周振鹤:《释江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41页。

用“江东”、“江左”等语。楚霸王项羽反秦即于吴地起兵,兵败后拒绝渡江,自惭无颜见“江东”父老。对于这一时期江南社会发展我们可以从《史记》卷一九中一窥大概:“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沓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可见此时江南尚处于待开发阶段。汉末孙吴立国江东后,都城建康一带的经济得到迅速发展,江南的范围由长江中游的两湖地区转到以建康为中心的下流的湘江、汉水以东以及淮南一带。《裴注三国志》卷七魏书七载:“布既伏诛,登以功加拜伏波将军,甚得江、淮间欢心,于是有吞灭江南之志。”^①此处“江南”即指孙吴政权统治的建康地区。其时“江东沃野千里”^②。魏晋南北朝时期江南得到进一步开发。

唐时“江南”一词一度被用来指称具体的行政区域。^③唐高祖改郡为州^④,唐太宗时为了便于管理,于贞观元年(627),以山河形成的自然边界,将全国郡州划分为十道。分别为关内道、河南道、河东道、河北道、山南道、陇右道、淮南道、江南道、剑南道和岭南道。其中江南道范围甚广,《唐六典》云:“凡五十有一州”,包括今长江以南,南岭以北,西起四川、贵州,东至大海的广大区域。开元二十一年(733),唐又将江南道分为东西道,并增置黔中道。江南西道辖今江西省,安徽南部和湖南部分地区,江南东道辖江苏南部、浙江、上海、福建地区。道在唐前期是作为一个监察机构存在,“安史之乱”后,随着藩镇力量的兴起,道成为实际的地方行政机构。宋朝改道为路,设有江南东、西路。江南东路管辖“府一:江宁。州七:宣,徽,江,池,饶,信,太平。军二:南康,广德”^⑤,大致包括今南京、皖南、赣东北部分地区;西路则相当于今江西全省。这样在

① (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40页。

② 同上,《三国志》卷54,751页,“中国失纲,寇贼横暴……江东沃野千里,民富兵强,可以避害”。

③ 见于史书的最早以“江南”作为行政区划名称的是王莽改夷道县(今湖北宜都市)为江南县。

④ (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六云:封建之天下,分其统于国;郡县之天下,分其统于州。后世曰道、曰路、曰行省、曰布政使司,皆州之异名也。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47页。

⑤ (元)脱脱等:《宋史》卷88。

唐宋江南道、江南路行政区域划分的基础上,广义上江南的概念逐渐清晰。五代时期,江南也用以特指南唐国。《宋史》卷三载:“辛丑,遣卢多逊为江南国信使”、“丁亥,谕吴越伐江南”、“冬十月己亥朔,江南主遣徐铉、周惟简来乞缓师”、“皇帝恭问江南国主”^①等,这里的“江南”,指的就是南唐国。

清顺治二年(1645)改南直隶(南京)为江南省,江南省大致相当于现在的江苏省、上海和安徽省。当时所管辖的江宁(南京市),苏州、扬州、淮安(楚州区)、松江(上海市)、安庆都是很发达的地区。顺治十八年(1661)分江南省为“府九:安庆、徽州、宁国、池州、太平、庐州、凤阳、淮安、扬州;直隶州四:徐、滁、和、广德,属安徽,江南左布政使领之。右布政使为江苏布政使司,治苏州。统江宁、苏州、常州、松江、镇江、扬州、淮安府七,徐州直隶州一”^②,此为江南分省之始。与之前多在地理行政基础上指称江南相比,明清时更注重江南各地间的经济联系。因此涉及“江南”的概念时有有苏松常镇或苏松嘉湖四府说、苏松杭嘉湖五府说、苏松常杭嘉湖六府说、苏松常镇杭嘉湖七府说、苏松常镇宁杭嘉湖八府说、苏松常镇宁杭嘉湖徽九府说、苏松常镇宁杭嘉湖甬绍十府说等。^③

从上述可以看出,不同时代“江南”的概念不断发生衍变,人们基于自然地理、行政划分和文化视角等不同的标准,对江南有不同的阐释。周振鹤先生在《释江南》一文中总结说:“江南不但是一个地域概念——这一概念随着人们地理知识的扩大而变易,而且还有经济意义——代表一个先进的经济区,同时又是一个文化概念——透视出一个文化发达区的范围。”^④这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江南做出了重要的导向。除了地理、行政意义的江南外,文化江南越来越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文化概念不同于行政概念,它的边界是比较模糊的。本文所指的江南从地理上而言是狭义的江南,大致以南京至苏州一带为核心地带,包括长江以南安徽省、江西省、浙江省的部分地区。长江下游的扬州地区,虽

① 马令:《南唐书》,南京出版社2010年版,第39页。

② 赵尔巽等:《清史稿》卷58。

③ 徐茂明:《江南的历史内涵与区域变迁》,载《史林》,2002年第3期。

④ 周振鹤:《释江南》,《中华文史论丛》第49辑,第147页。

然地理位置在江北,基于吴和南唐历史关系的考虑也包括其中。

2. 生态江南

地理环境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往往通过影响人类活动和生活方式进而影响文化的生成发展。南北环境,从气候学的角度说,由于地形、所处纬度等不同,因而受季风气候影响的程度不同,气候变化的幅度随纬度的增高而增大,南方气候变迁幅度普遍没有北方大。竺可桢先生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5000~3000年前,黄河流域的年均温度较今约高2℃,冬季温度则高3℃~5℃,相当今长江流域的气温。^①旁证了这点。江南,处于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的地区,与北方温带季风气候,四季温差大、降水量少的特点相异,江南气候温暖湿润,降水丰富。“春雨江南,秋风蓟北”。这句话就形象地概括了江南和北方自然气候的差异。多雨,梅雨,伏旱是江南气候显著的特点。这种气候条件适合多种植物生长,因此江南地区四季草木华滋,郁郁葱葱,有大量可以观赏的植物,如桂花、杜鹃、山茶、石榴、蔷薇、竹、芭蕉、梅等,这些植被生长时间较长并且自我更新的能力也较强,因之所形成的生态景观与北方不同。北方被描绘为“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高适《别董大》)甚至“树林何萧瑟,北风声正悲。溪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曹操《苦寒行》),酷寒艰涩,与此相比江南则“吴越暖景,江山如绣”。《世说新语·言语篇》有多处描绘时人深入山水对江南秀美山水的喜爱,“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王子敬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②梅雨无疑是江南地区的又一个重要特征。“梅雨”得名于江南每年的六七月间,梅子成熟之际,会有一个月左右时间,天气闷热潮湿且阴雨连绵,这是由于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季节性北上,南方的暖湿气流和北方南下的冷空气相遇而产生锋面雨所致。诗文中“闲梦江南梅熟日,夜船吹笛雨萧萧”(唐皇甫松《忆江南》);“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宋赵师秀《约客》);“一川烟草,满城风絮,

① 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载《人民日报》,1973-6-19。

② (南朝)刘义庆撰,朱铸禹汇校集注:《世说新语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32、133页。

梅子黄时雨”(宋贺铸《青玉案》)描绘的就是江南梅雨时期的天气特点。

江南以“水”著称,除丰富的降水外,从地貌上看,江南亦多水,多丘陵,古有三江五湖之说。据《史记》卷二九,三江是指南江、中江、北江。其北江从会稽毗陵县北东入海,中江从丹阳芜湖县东北至会稽阳羨县东入海,南江从会稽吴县(今苏州市)南东入海。五湖,郭璞《江赋》为具区、兆溇、彭蠡、青草、洞庭。历史发展中虽然江河湖泊会由于自然人为等因素盈缩变化,但纵观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水资源一直比较丰富,有的地方淡水水体还会扩大。如鄱阳湖古称彭蠡湖、彭蠡泽,《汉书·地理志》载“豫章郡彭泽”,它是由长江迁移而形成的河成湖。唐末五代至北宋,彭蠡湖分别向东、向南扩展,宋元时期的鄱阳湖即有“弥漫浩渺,与天无际”的景观。江南拥有长江和钱塘江两大水系,地表河密布,水系发达,而且在长期的开发中,兴修了大量的水利工程使之相互连接。如泰伯开泊渚,伍子胥开胥溪,夫差开凿邗沟与扬州大运河等等。李伯重先生认为江南地区的划分依据主要在于其有同一水系,使内部形成较为紧密的联系。“太湖上纳二溪之水,下通三江泄洪入海,形成太湖水系的中枢。太湖水系的主要河流,多为东西流向,而江南运河则纵贯南北,把东流诸水连贯起来,使得江南水网更为完备。此外,应天(江宁)府的大部分地区,本不属太湖水系,但通过人工开挖的胥溪运河,亦与江南水网相接”。^①这也从侧面说明了江南水网之丰富。江南“水乡泽国”的美誉实为名至实归。古代诗文中多以水国来指称江南,如“水国周地峻,河山信重复”(南朝颜延之);“烂漫春归水国时,吴王宫殿柳丝垂”(唐皇甫松《杨柳枝》);“故人还水国,春色动离忧。碧草千万里,沧江朝暮流”(唐刘长卿《送姚八之句容旧任,便归江南》)。衬之水的秀韵和灵动是江南多丘陵,山体不高,“水随山转,山因水活”,因此构筑了与“平林落日”不同的地理景观。南朝文学家吴均《与朱元思书》对江南自富阳至桐庐一带自然风光的描写,“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东西。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将江南美景描绘得浑然天趣,是颇有代表性的江南景致。近代汪辟

① 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

疆先生尤为青睐江南山水,云:

江浙皆《禹贡》扬州之域,所谓天下财富奥区也。其地形,苏则有南北之殊,而皆濒海贯江,山水平远,湖沼萦回;浙则山水清幽,邻赣闽者,亦复深秀。^①

灵山秀水造就了江南人特有的秉性、气质、风俗和审美观念,生于斯长于斯的江南人所创造的江南文化不能不称之为特别。

(二)江南诗性文化内涵

1. 南北地理人文对文化的影响

一个地区的文化与这个地区的地理环境有着天然的联系。中国地域辽阔,南北地域各自有鲜明的特点,影响人们的生活生产经验和思维方式,进而形成文化的诸多差异。在中国文化中很早就注意到地域环境对人精神层面的影响。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十五国风,即采集自西周时期十五个地区的乐歌,反映了不同地域的民情风俗,内涵丰富且影响深远。春秋战国时期盛行以乐观地域民风的文化活动,《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中记载吴公子季札观乐:

吴公子札来聘……请观于周乐。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为之歌《邶》、《鄘》、《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

在季札看来,不同地区的乐歌所代表的是不同的地方风情和文风,体现出勤劳而不怨恨、忧愁而不困顿、忧虑而不畏惧等内涵各异的人文特色。

古代学者很早注意到从地缘南北角度来分析南北学术和文化的不同。《世说新语》中褚季野语孙安国:“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孙答曰:“南人学问,清通简要。”支道林闻之曰:“圣贤故所忘言。自中人以还,北人看书,如显处视

^① 汪辟疆:《近代诗派与地域》,《汪辟疆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45页。